

# 陈虬思想变迁研究

陈安金 冀晋才

---

**提要:**陈虬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其思想变迁与清末政局演变息息相关,其变迁轨迹可谓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化的典型。大致以中法战争为界,其思想变迁历经守旧排外、复古改制和吸收西学变法维新两个阶段。陈虬思想中鲜明的追求实效的“事功”特质以及积极的经济维新思想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 陈虬 思想变迁 研究

作者陈安金,男,温州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冀晋才,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温州 325035)

---

陈虬(1851—1904),浙江瑞安人。原名国珍,字志三,号蛰庐,自称皋牢子。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生前就广受时人称誉,其著作有《经世博义》、《治平三议》、《救时要议》、《报国录》等,内容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曾一度在浙江士绅中乃至全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1893年,他的8卷本《治平通义》由瓯雅堂镌刻出版,立刻受到社会重视,据说两江总督张之洞“见陈氏《通义》而大悦,渴欲接谈”<sup>①</sup>。梁启超曾将此书列入《西学书目表》。时人将他与宋恕、陈黻宸合称为“东瓯三杰”,与汤寿潜(号蛰仙)合称为“浙东二蛰”。他一生因以“永嘉学”继承人自居,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立身之本,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安定,积极探索和实践而为史家所称誉。

陈虬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思想,其思想上承宋代永嘉学派“事功”思想,以经世致用、谋求国家富强为本,不断地打破封闭守旧,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在清末近代化历史大潮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因而其思想变迁与清末政局演变息息相关,其变迁轨迹可谓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化的典型。大致以中法战争为界,其思想变迁历经守旧排外、复古改制和吸收西学变法维新两个阶段。本文旨在从清末历史背景和温州地域文化角度入手,深入探究陈虬思想变迁。

## 一、守旧排外 复古改制

第一个阶段思想变迁主要轨迹是从守旧排外转向复古改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

---

<sup>①</sup>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7—538页。

侵略不断加深,中华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主权不断沦丧;国土被寸寸割让;原有的儒家统治思想受到质疑甚至逐步被否定,危机四伏。清末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战争频仍。清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上的软弱乏力日益暴露。民族矛盾加剧下国人心中有普遍的仇外情绪,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变法革新之必然性和紧迫性。但通讯手段落后、地域的闭塞以及国人盲目的虚荣自大贪图安逸心理等因素,改革变法思想并未形成普遍的响应和支持。

这一时段其思想内涵和动态主要反映在《治平三议》、《十科表》、《报国录》中。主体特征经历由站在中国人立场上单纯的仇视排斥西方侵略者向寻求复古改制以重振中华天朝上国神威的过程。内容较为碎片化,呈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特点。

出身于清代旧教育的陈虬思想充满了忠君报国思想,这也影响了他一生。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姚莹《康轶纪行》等书籍不断在国内流传。洋务运动期间,近代化的海军、陆军、企业相继建立,一批批有志青年被送往国外留学。他们从历史、地理、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将世界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将大清国的深刻危机爆料在国人面前。中国人开始逐渐放大眼球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己。而1876年温州的开埠更促进了陈虬思想的开放和进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能的产生抵触和排斥。1880年,他作诗《过耶稣堂》:

周孔遗书在,耶稣教枉传。生难逃十字,死乃历千年。性未离羊犬,人便讲圣贤。……西学原征实,缘何异教雅?混元谁做主?造化竟生儿!辟鬼虽非妄,生天只自知!如何南、利辈,抵死不相譬?<sup>①</sup>

无理恶毒谩骂,简直歇底斯里。在这种仇视心态之外,更存在一种浅薄的鄙视,《治平三议》中《大一统议》的设想最反映问题,基础思想是“大一统”,与我们传统意义的大一统不同,是全世界的大一统。“万国并建,天必笃生非常神圣之人与天地合撰,与日月合明,使之宪章往古,开辟中外,创古今未有之盛治。故于万国之中,群推以为君……异徽号、改正朔、议明堂、讲辟雍、制郊祀之礼”“损益十科之法以治王畿,而复约于东西半球之中设监二,各降以王爵,文曰宣文,驻印度,武曰靖武,驻美国”。“通钞法,均量衡,同文字”“齐天下之耳目,以一万民之心智”<sup>②</sup>。

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国人心中那点可怜的自尊被侵略者的大炮轰的粉碎,知识分子们开始被迫反省。也是在这股反省大潮中,社会学术逐渐走向经世致用,但这个过程反复、艰难而又漫长。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碰到困难往前看,寻找来自于历史的启示,时代越古老,经验越权威。最大的权威便是周公、孔子,乃至三皇五帝尧舜禹。于是我们看到近代化的开端便是复古思潮。而复古的前提是否定当前思潮,即宋明理学、乾嘉学派,实质是汉代学术和宋代学术思想。这两派思想在应对清末危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无力与僵化,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陈虬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881年作诗《读〈宋史·道学传〉》:

日月尼山万丈辉,诸贤只比众星依。庸奴妄自群相贵,大道新知统已微。康杰图书皆赴影,考亭语录半禅机!泰山梁木成古今,猎猎悲风起泗、沂。<sup>③</sup>

虽然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伦理奠定了宽容开放的基调<sup>④</sup>,但是,陈虬认为儒家思想变成理学这个样子,大道已逝,可悲可叹!由此开始了对于国家改制和民族复兴的思考,放弃了固守现存制度,寻求革新国家制度,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① 陈虬:《过耶稣堂》,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0页。

② 陈虬:《十科表》,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页。

③ 陈虬:《读〈宋史·道学传〉》,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0页。

④ 张亚月、张薇薇:《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族宗教及其功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首先,政治上主张“援法入儒”,对周代宗法制、井田制稍加改动来对国家进行全面改制。《宗法议》是地方制度改革,陈虬援引孔子语“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孟子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认为“欲治天下者亦务其亲者、近者而已矣”。《大学》云“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应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而引用孔子语出自《礼记·乡饮酒义》,其前文是:“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民入孝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孝悌治家、治国,民知孝悌“能犯上者,鲜矣,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所以王道的推行很容易,这也是历代帝王治国道之一。陈虬之《宗法议》的基础便是以孝悌治家为本、以家庭为基础的基层宗族自治制度。所以他说:“天下之子无不孝也,天下之弟无不悌也,父无不慈也,兄无不友也。以父兄之无不慈不友也,而子弟乃有不孝不悌,何也?甚爱则狎,甚狎则犯……欲善其道则莫如宗法。”<sup>①</sup>并加入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于一乡之中,设宗子一人,而复设宗正以为之辅。凡事皆决于宗正,朝廷皆给以图印。宗子以长,宗正以德”<sup>②</sup>。由合族公举。婚嫁、教育等有定制,违者处以重罚。宗子、宗正并监理地方治安等事务,惩罚措施非常严酷,有刺面、刺臂、砍手脚、割鼻子、刺眼睛等各种残害人体方法。寻求对每一个族群的治理,以期实现国家的大治。

《封建议》主张恢复西周之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上古官制、经济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第一步便是复井田,原因是当时的土地兼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第二步是复“三税”,即田租、市廛(商业税)、赋(人头税),以解决清政府由于巨额的战争赔款、常年的战争消耗、官员的贪腐、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财政危机。清前期“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的实行废除了人头税,商税也有严格定制。政府欲扩大税源,只能从别的方面打主意,于是地方官发明许多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卖官鬻爵、关卡林立、科派繁重。陈虬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地方诸多弊政以及中央的财政危机。第三步是恢复上古学制,以宗族为单位建立乡学,教授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另附《十科表》于后面,即国家政府机构设置及官吏名称、职责等内容,将国家政府机构划为十科:历科、医科、农科、工科、礼科、乐科、刑科、兵科、训科、钞科。

这些思想不是陈虬的原创,早在1860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便提出相似观点,28年后陈虬得观《抗议》:“三代圣人之法,后人多疑为疏阔,疑为繁重,相率芟夷屏弃,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谓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积今二千余年,而荡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挟空言以争之,而势恒不胜,迨乎经历世变,始知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sup>③</sup>首先歌颂伟大的圣贤,继而呼吁恢复圣贤之法:“观于今日,奉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而始知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除了学习西方近代科技以外二者基本一致,他说:“议凡四十九条,与拙作《治平通议》颇多异同。”<sup>④</sup>可见由于地域的局限性,陈虬思想落后时代远矣!

其次,军事上主张利用古代兵农合一体制改革兵制,利用古代军事思想、战阵之法训练军队以图抗敌御辱。《报国录》全面阐述了他的设想:“《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光绪甲申,中法失和,沿海戒严,将录以贻当事,初名《东瓯防御录》,会事解不果,因重加改定,今易名。”<sup>⑤</sup>所谓团防,是一种全面的社会组织制度。包括地方治理、教化、防御、兵农合一等许多内容。简单言之,他想恢复或者变革上古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以解当时危局。他对当时盛行的洋务运动深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下竟言

①② 陈虬:《治平三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③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④ 陈虬:《书〈校邠庐抗议〉后》,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2页。

⑤ 陈虬:《〈报国录〉自序》,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自强,舍治兵不能以立国,而制实莫善于团防”;“古之为治,初不言兵,寓之于农,寄之于理。当时政教修明,人安其业,无事于兵,非讳言之也。”<sup>①</sup>他仍然极力称赞上古之治,认为后来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后人不守古制。“周衰道裂,官司失守,封建废而郡县起,井田、学校,始一切无所附丽。古制俄空,上下不复相维,国势遂渐趋于弱。一二权谋才智之士,思有以持其倾而救其弊,乃争起而谈兵,专门之学,鲜有会通,不复能推先王经国体野之大法,于是中国二千余年长蒙兵事之祸。”<sup>②</sup>“夫法岂一端可尽哉!背水以犯死而生,增灶以复古而成,用法而不为法所用……寓之农,寄之理,农理可秉,谓兵独不可以或有所欲寄者,是仅知金刃之用异斧斤,不知缓急其利害……”<sup>③</sup>他从崇圣、待士、养廉、罢徭、蠲贷、采办、赏兵、恤囚、裁嫔、褒忠这些方面对社会不同阶层宣扬大清皇帝圣恩,其想法不外乎呼唤国人忠君报国之心,使军民上下一心,自觉拥护并积极参与变法。

在具体的抗敌举措上,主要是保甲制度,略作改革,形成一套完善的统治网络。继而沿海筑城、沿江开港,进行大型防御工程建设。欲以沿海建设土城、江面建设呈犬牙交错型一字长坝加以炮台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认为“善御夷者,守外不如守内,守远不如守近,守正不如守奇,守阔不如守约。当使敌有堵截之虞,吾无拦阻之累……”<sup>④</sup>选渔民为伍,使用小船“从黑夜,或乘上风,十数为群,注意烧焚。各带器具,锥凿斧斤。挨近舟次,蛾附蜂屯。平时四布,星散无数。敌炮虽利,用非其地。若出小船,圈使不前。纵有神龙,坐困则蝼蚁得而肉之;虽有猛虎,入陷阱则群羊得而蹴之”<sup>⑤</sup>。

他的一系列建议虽针对时弊,但充满鲜明的复古性和空想性,丝毫未触及统治阶级和统治制度本身。儒法并用,也颇遭时人诟病,宋恕便认为“志三著有《治平通议》,其宗旨与礼不合”<sup>⑥</sup>，“先生兹议,辨界儒法,似犹未精,岂惮骇习士,姑杂叔世语欤?”<sup>⑦</sup>军事上未做到“知己知彼”,其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所以其意义不在于举措内容,而在于他敢于打破僵化社会体制积极寻求变革。其中也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民主选举领导人等先进思想,他说:“后世法家倡导尊君之说,于是乾纲独揽,居其位者辄以犬马之道驭其臣民,威福自专,复侈然日从事于声色、苑囿、犬马之娱,而篡弑之祸烈矣。”<sup>⑧</sup>

## 二、吸收西学 变法维新

第二个阶段的陈虬思想开始积极吸收西学形成成熟的维新变法思想。其思想转变从中法战争期间开始,在经历乡试、会试等一系列活动中,与温州、浙江乃至全国知识分子不断地接触和互动,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知识、阅历迅速增长,思想观念突飞猛进,逐步完善而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在维新变法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跃然跻身于清末维新思想家行列。其思想虽不脱“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也有其思想特质。体现到陈虬思想的急剧进步发生于中法战争前后又有其特殊原因,因为战场邻近温州,切肤之痛促使他开始思考当前危机并积极寻求改变之法。其思想遂有急剧发展态势。

在这一个阶段,陈虬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初步完成了大作《治平通议》,《书〈校邠庐抗议〉后》中有语:“与拙作《治平通议》颇多异同,可并存也。”这部书由鸥雅堂 1893 年 12 月镌刻出版,包括前面提到的《治平三议》和《报国录》以及《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和《螿庐文略》。《报国录》和《治平三议》前面已经论述过。因此此阶段陈虬新思想主要体现在《救时要议》、《经世博议》。《经世博议》是

①②③ 陈虬:《〈报国录〉自序》,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3、84、83页。

④⑤ 陈虬:《报国录》,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100页。

⑥ 宋恕:《宋恕论陈虬》,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页。

⑦ 孙诒让:《孙诒让论陈虬》,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5页。

⑧ 陈虬:《治平三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

充分展现陈虬维新变法思想的经典之作,其中包含陈虬系统的变法思想以及具体的变法举措。

(一)“欲图自强,首在变法”

《经世博议》之进步指出首在于旗帜鲜明的提出变法口号,并且论证了变法之合理性问题。儒家思想主张以“孝”治国,孔子曰:“三年无改其父之道,可以谓之孝矣。”所以,变革祖宗之法就会摊上“不孝”的罪名。如何解决朝堂上下内心这个道德坎儿,成为清末维新思想家乃至历代以来变法家们首要解决的难题。陈虬引用《吕览》中语:“闻之《吕览》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sup>①</sup>阐述变法是时代发展题中之义,“法之变,国势驱之也”<sup>②</sup>。继而列举从上古鸿蒙初判到当今通商以来复杂时局,情况产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天朝上国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拳毛深准,自古侏不通中国者,群挟其智巧技能与吾争声明文物之盛。”<sup>③</sup>因此国家需要变革治国之法,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时局。“盖风气无十年而不转,法制无百年而不变。”<sup>④</sup>“法之变,国势驱之也。”<sup>⑤</sup>这与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原因,拉出伟大的孔圣人来做挡箭牌有根本的不同。但陈虬也吸收了康有为“西学中源”说,即从学术上考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学的是孔圣人以后历代野心家篡改的儒家经典,不是真正的夫子经典:

夫两汉君臣、儒生,遵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纂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闾而不明,鬱而不发。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矣!<sup>⑥</sup>

后世儒者背离孔子之道墨守陈规,导致今日大清危机。继而说“礼失求诸野”,夫子之道散落四夷,而当时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正是或者暗合上古周孔之道。比如议院,“议院之设,中土未闻,然其法则固吾中国之法也。考之传记,黄帝有明堂之议,实今议院之权舆”<sup>⑦</sup>。所以向夷人学习不是学习夷人之道,而是重新找回中国遗失的圣人之道。《经世博议序》中就说:“寻其(西人)所治,皆仅得六经诸子之绪余,乃或立足致富强,亦可见中国圣人之教普也,况乎其更有精焉者乎!”<sup>⑧</sup>

然而历代以来变法者们的悲残结局始终让那些倾向于变法的人惊惧不已,为了打消时人心中顾虑,陈虬论道:

卫鞅、王安石之徒起而议变法,持之甚坚,成之甚效,而祸亦甚烈者,何哉?盖变法以自营其私,则背天理之公;下情不通,则上天不佑……迨法穷弊生,祸乱即成,乃归咎于变法,夏商周以来,其未造之所以失,岂皆由于变法所致耶?不知所以变与变之不得其道尔!

历代变法失败皆因为变法者贪图私利,不明变法之要而已。只要变法出自于公心,掌握变法之“道”与“法”,即可消除祸患之虑。继而又论证变什么的问题。圣人之道,此乃天道,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1889年乡试第二卷《日月星辰系焉》中论道:“盖太空一集气之区,惟天真不动,有假太空之气以为体者,咸各据其高下大小之枢机,旋转于昼夜之间,不使有一息之停,而其力始得摄而不坠”<sup>⑨</sup>,即“天”是不动的,“天”就像一个外壳,里面是太空和万物,太空积满大气。星体得以飘在天上坠不到地面,是因为大气、天体不停地高速运转。而“道”出于“天”,与“天”一体,所以“道”是不能变也不会变的。历史上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改革成败皆看它是否得“道”。陈

①③⑧ 陈虬:《《经世博议》序》,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16、16页。

②④⑤ 陈虬:《《经世博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19、18页。

⑥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

⑦ 陈虬:《上东府张宫保书》,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1页。

⑨ 陈虬:《日月星辰系焉》,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虬以这篇文章考取末名举人,说明他的宇宙观得到了阅卷老师的认同,也证明他的思想具有社会共性。在士人心中上古时代国泰民安、社会和谐,是因为先王以“道”治国,“故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为治不同,同归于道也”<sup>①</sup>。所谓“周裂道失”,后人为了私利用一己之见对社会进行变革,始有“法”有“术”,以法、术治国,皆因时而变。所以历史上只有“变法”而无“变道”,变的是“法”,即治国之法。

## (二)吸收西学,改良中国

陈虬所谓具体“法”之变革,主要是清朝政治的内部调整,基本是《治平三议》《十科表》的扩大版。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即吸收西学改革中国政治经济乃至教育。

首先,吸收西方议院观改良中国政治。陈虬最早提出在中国开设议院,在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凡荐辟、刑杀人,皆先状其事实于议院,有不实不尽者改正”<sup>②</sup>。陈虬之“议院”仅仅借取了西方议院之名,这与同时代维新思想家有一定差距。紧随其后提出议院观的陈炽游历山东、江浙、闽粤、香港、澳门等地,“感念时变,综古今中外全局,著《庸书》”<sup>③</sup>,认为设议院为西方之所以强大的根本。主张是参照欧美议院制度,在舍利乡官的基础上,推荐士绅作为参选议员,“县选之达于府,府举之达于省,省保之达于朝,皆仿泰西投匭公举之法,以举主多者为准则……”<sup>④</sup>设议院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表明陈虬开始真正采用西方政治理念。

其次建议采用西学变革科目之法。就是官学书院教授学科科目以及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他认为“夫科目者,人才之所出、治体之所系也,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很前位,也确实很有见地。八股取士的弊端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然而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为求出人头地,实现理想和抱负,皓首穷经,到头来大多百无一用。关键不在他反对旧制度,而在于他提出的新设想。他主张改设五科:曰艺术学;曰射;曰算(试《九章》);曰西学科:分光学、电学、汽学、矿学、化学、方言学六门,试以图说、翻译。<sup>⑤</sup>

第三,建议采用西方律师制度,虽然他没有提出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议,但是能够做到借用西方法制中优秀部分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又是一大突破。

第四,建议采用西方经济模式进行经济改革。“自通商以来,皆知自强之道首在理财”,其实真正开始去办近代实业以富国强兵的就是洋务派。然而,“海上之招商局、开平之铁路……近二十年矣,而权其得失,或入不偿出者,则以要领之未得也”。以旧官僚衙门式组织和管理办法办工商失业,弊病百出,陈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提出六点建议。第一点是“裕财用”,即丰富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采用西方公司模式办实业公司;发行国债;扩大出口。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继而又希望引进西方公司模式,扩大出口贸易,他认为:

西国每立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益操券,始准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保董事十二人,由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办受成于各董,各董受成于各股东,上下钳制,耳目昭著,自然弊无由生。<sup>⑥</sup>

这段话虽然引自他人,但是陈虬一字不易摘录与自己最得意的著作中,可见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深深信服的,由此可见陈虬对于西方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1889年陈虬针对温州特产药材、茶、矾、瓯柑出口不畅且屡受外商控制导致亏损这个问题,就做文章《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呼吁温州人团结成立一个公司,请精明商人主持,在上海、郡城等地设局专卖,“拣正货物、平定价目、分次出口,以我驭人,而不为人所驭,方可稍持利权”<sup>⑦</sup>。由此可以照顾百姓产品收入,增加商人收入,还可以增加政

①②⑤⑥ 陈虬:《经世博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21、22、38页。

③④ 宋育仁编:《陈焜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3、108页。

⑦ 陈虬:《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府税收,一举多得。并希望将这种主张推行全国,以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解决中国部分经济问题。他呼吁“自通商以来,天下大局皆以强并弱、以大并小。久而不知变计,将土产小贩日窘,中国利源日竭,长此不返,将何以国?当道诸公有国计民生之责者,亦盍加之意乎!独温州乎哉?”<sup>①</sup>

第二点是“开新埠”,就是自主增开商埠,积极打开国门与外国贸易,堪称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

第三点是兴制造。希望政府奖励、鼓励技术创新,从而改变士人心中轻视“奇淫技巧”的看法,改变“士不知工”的局面,以促进工业发展。

第四点是奖励工商,严格工商制度“工创物、商销货,皆令有积可稽,给照存执”。有成就者且创利税多者赐官、赐爵甚至国史立传。

第五点是懋迁,主张政府设局采购国内优秀产品,售往世界各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竞争观念。

第六点是安抚华商。我国商民有很多居于南洋或者欧美的,由于国家的贫弱和在国际上地位的低下而饱受欺凌、排挤。陈虬建议将他们设法召回国内量才任用,因为“夫华工久在西国者,于制造、机器、矿务诸西学濡染既深,当能得其指要。若诚能于此时特饬各钦使晓以祸福,因势利导,设法召回内地……中国亦从此得格致之学”<sup>②</sup>。在我国近代抵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自由独立以及新中国建设中,华人华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应了陈虬当日的期望。

引进公司制,奖励专利、创新,扩大出口,开放通商口岸扩大国际经济交流,召回流失人才,重商主义与商战思想是陈虬维新思想中最大的闪光点。陈虬终于逐渐的走出理想国,走向现实,走向开放。这一系列议案从前到后反映出他不断开化的思想,虽然这样的大度和宽容接纳西方文明侧重或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文化层面还只是涉入皮毛,但是他具有精准的观察社会眼光、敢于切实接纳优秀文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在清末维新思想家中独树一帜。

近代温州儒学曾经站在“主乎中道,辅以西艺”的立场上,主动调适中西方的文化冲突,矢志追求区域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型。陈虬渴望超越汉宋两学,接触社会现实,践履人生责任,并以宋代永嘉事功学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自命。其维新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事功”特质,不论是复古还是维新,终究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其大胆打破传统,“融会中西、以利和义、力行经世”的思想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当代温州人“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业,敢于创新”的精神,与以陈虬为代表的温州近代思想先驱们的思想特色可谓一脉相承。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 陈虬:《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② 陈虬:《经世博议》,胡珠生编《陈虬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41页。